

上海沦陷区的文化控制与杂志出版及其文化选择考

申東順*

<目次>

- 一. 引语
- 二. 上海沦陷区日伪势力的文化控制
- 三. 沦陷区杂志出版统制与出版界情况
- 四. 沦陷上海出版文化人及其文化选择
- 五. 小语

一. 引语

有一部韩国的电影《选择》，讲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四十五年的艰难岁月，在出狱前他说了一句话：“人们以为自由在监狱外的世界，可是我们真正的自由在监狱内，这就是良心的自由”。——或许我们正可以用这句话对本文研究的内容作更深层次的解读。

人们通常将“监狱”作为殖民统治的罪恶的集中体现与象征，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沦陷区进步文化人所受的入狱之灾，确实血淋淋地揭示了沦陷区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与非人道。但如果以为“监狱”之外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那就会形成一种严重的遮蔽。而这正是殖民者所要竭力制造的虚假的现实。

首先，殖民者总要以“解放者”自居，如柯灵先生所说的那样，日本入侵者就是将他们全面占领上海之日定为“解放日”的，而他们所推动的所谓“和平运动”、“新国民运动”、“大东亚共荣运动”，也无一不打着使中国从“西方侵略势力”与“共产主义威胁”下

* 安養大學校 講師

解放出来的旗号。这正是殖民者的逻辑：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占领就是解放。——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宣传，它不仅是支撑当年日本占领军侵略行径的逻辑，而且直到世界人民、亚洲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拒不承认历史罪责，其所坚持的，仍是这样的“占领就是解放”的殖民者逻辑。更要看到，这是一切侵略者、殖民者、国际霸权者，以及一切独裁者共同的逻辑：美国入侵伊拉克，不就是打着“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帜吗？而萨达姆在为他的独裁统治辩护时，也同样打着“维护伊拉克人民独立自由”的旗帜。本文所要研究与揭示的日本上海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就是这样的所谓“人民的解放者”以“自由”的名义所进行的统治。它的本质是要占领与支配被入侵国，那里的人民所得到的新的“自由”与“解放”，最终只能变为对殖民国家，特别是其统治集团利益的服从；但它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是在“吸鸦片式”的“满足”与“幸福”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实现社会与人的奴化。

而且我们绝不能低估这样的虚假性与欺骗性的作用。不能否认在最初占领阶段的萧条以后沦陷区曾有过的繁荣，不仅上海都市经济有了复苏与发展，包括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文学、出版事业，在1942年末至1944年秋，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文化虚翬病”。这样的繁荣与发展是殖民统治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殖民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制造繁荣，促成发展。但这样的繁荣又必然是畸形的，这也是殖民统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这样的被占领状态下的畸形繁荣，更是急剧地促成了社会与人的物化或异化，造成了虚假的世界与人生，掩盖了殖民统治的血腥，以及畸形繁荣背后的贫困与剥削。更不可忽视的是由此造成的人的精神危机：不仅市侩哲学、活命哲学，颓废、玩世、享乐主义……风行一时，而且满足与依附殖民统治的殖民地意识也会不知不觉地渗透于市民意识之中。正是这样的被占领者的殖民地意识，构成了殖民者、占领者逻辑的社会基础，其影响更不可低估。

还应该指出，以往我们对沦陷区的研究的简单化，例如对沦陷区生活的描述，只强调“水深火热”这一面，而有意无意掩盖其畸形繁荣与发展这一面；只强调敌人的暴力镇压这一面，而忽略其怀柔、发展政策的作用；只强调人民的反抗，而不愿正视殖民地意识的影响，麻木、屈从，以至迎合——这些国民性弱点的表现。这不仅遮蔽了

歷史的複雜性，而且殖民統治的辯護者正是由此乘虛而入，借口恢復歷史的“另一面”，將其無限誇大而達到美化殖民統治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正是看到了簡單化所帶來的後果，而強調尽可能地展示歷史的各個側面，努力揭示歷史的真相，這不僅是學術研究的科學性所必須，而且也是針對着殖民統治及其辯護者的虛假性的。

其實在殖民統治建立之時，即已開始了這樣的反虛假性的努力與鬥爭，這也是上海淪陷區進步作家、知識分子的基本選擇。處在這樣的被控制的異化社會環境中，處在虛假意識形態的包圍中，他們的創作既是異化社會的一種反映，又是從異化社會語境中再度異化出來的，對既存現實的批判與否定。淪陷區文學與殖民統治的對抗性，集中表現為控制與反控制，虛假與真實的搏鬥：殖民者不但要操縱現實世界，而且要用一切統治手段將大多數市民引向他們所需要並精心製造的虛幻世界，以達到精神控制的目的；而淪陷區的反抗文學的根本使命，就在於傳達真實性，幫助讀者擺脫虛幻的不真實的世界，敢於正視自己真實的生存處境，尋求真實的人生意義與價值，使殖民統治的虛假的意識形態與精神控制失效。在這樣的掙脫虛幻的自由假象，正視真實的不自由的过程中，所有的人——作者，編者，以及讀者，就獲得了前述韓國影片中主人公所說的“監獄內的自由”：“良心的自由”。

二. 上海淪陷區日偽勢力的文化控制

上海淪陷區，如果說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曾巧妙地隱藏帝國主義邏輯來傳播“文明”，用笑臉紳士般地佔領上海租界，日本帝國主義就直接用非人道的暴力實行軍事統制，並以暴力威肋壓抑人心，以實現對上海淪陷區的全面控制。

日本帝國主義，一面為了戰爭物資的確保和對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加強了對上海物資封鎖和統制，實行全面軍事管理，強行規定租界的工廠和商行都必須與日軍或他們的“合作者”打交道，各企業一律並入了日本人控制下的“國策公司”，受到一貫統制。日本帝國主義的管理和統制體制導致了上海經濟嚴重的破壞和市場的畸形

流动，刺激了通货膨胀，尤其引发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膨胀，造成了上海经济大混乱，以致“饿莩盈野……个人的或是合家的望着万寿桥下跳去自杀的人数是加速度地激增着”¹⁾。另一面，他们向伪政权、特工与社团组织进行强化控制政策，除了统制政治、经济外，还对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操作与隐蔽。这是日伪统治的“两手”，一面是经济物资的统制与政治管制；另一面是通过奴化的文化政策，进行精神意识的控制。

那他们如何具体进行这些精神意识与文化的控制。首先是通过汪伪政权推行“和平运动”。“和平运动”主要是进行所谓“心理建设”与“文化沟通”。汪伪政权提出，“对国民的心理进行根本的改造”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基本方针。伪国民政府行政院专门增设宣传部，以“担负心里建设的使命”。1941年6月2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²⁾，又连续开办了三期中央宣传讲习班，广招知识青年以及基层政权、团体骨干人员参训，以培养“和运宣传人才”。为了将“心理建设”在社会形成高潮，汪伪政权非常重视“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并要求舆论的先导。汪伪宣传部所直接控制的伪新闻统治机构——中央电讯社、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中华电影公司、中华日报以及中国报业经理处等为“心理建设”均专门制定了宣传实施措施。“和平运动”的文化沟通工作由伪“中日文化协会”负责实施。该委员会由汪伪政权外交部长褚民谊，内政部长陈群、教育部长赵正平、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起组织，于1940年7月成立。上海分会章程第二条规定“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其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³⁾ 协会成立后，遵照汪精卫的旨意，积极举办各种文学艺术讲座及演讲，发行和翻译出版各种著作，组织学术的联合研究，举办各种文化展览会，图书交换，互派留学生，组织旅行团、放映电影等方式，来研究和宣传“东亚文化”，进行“中日文化沟通”。

1941年11月，汪伪政府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和平运动”过渡到“新国民运动”。这一“新国民运动”在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领导下，一直持续开展

1) 兰兑；《饿莩》，见于《万象》第1年第6期，上海，万象书屋，1941年12月1日，第114页。

2) 《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特辑，见于《政治月刊》第1卷第6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6月20日，第71页。

3) 《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章程》，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48-1444。

到汪偽政權的覆滅。按汪偽政權的解釋，“新國民運動”是實現東亞聯盟的重要形式，兩者的關係為：“東亞聯盟為新國民運動之必然歸趨，而新國民運動則為東亞聯盟之具體的實行”，是對“東亞聯盟運動”對內方面要求的具体化。因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兩個運動便合流了。因此1941年以後，上海的思想教化運動，稱“新國民運動”更為合適。

新國民運動分為輿論宣傳與組織實施兩個階段。1942年元旦，在“新年團拜會上”，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宣布了《新國民運動綱要》。一個月後，再次發表《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⁴⁾，強制“新國民運動，要注意到每個人，都能將發生增進的力量，組織起來，使成為整個團體的力量”，“每一個國家”要將這些力量組織起來“使成為集團國家的力量”。汪偽“新國民運動”所要樹立的“新精神”，實際上就是大亞洲主義理論中所鼓吹的“集團國家共存共榮”思想，無非是讓中國人民盡其全力地去，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出力。為了灌輸“新精神”，以實現“精神總動員”，汪精衛偽政權在政府機關及學校、文化團體中廣泛組織了“宣誓”⁵⁾活動，宣誓者要“誓一致誠懇接受最高領袖之指導，服膺三民主義，勵行新國民運動，完成中國革命，實現東亞解放，盡忠竭力貢獻一切”。這種宣誓活動從1942年3月11日起，共計有數十萬人參加。1942年6月，汪偽政府於南京成立了“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以此為標誌，“新國民運動”進入全面實施的新階段。華中日偽統治區各系統、各行業、各部門均分別建立了新國民運動的促進團。新國民運動的重點在青少年身上。1942年7月4日，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便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隨後，在淪陷區普遍設立了“青年團”和“童子軍”機構。⁶⁾ 1942年8月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00周年，汪偽行政院宣傳部為此專門發出第82號宣傳要點，要求各報社、各通訊社、雜誌社以及宣傳機關，“以增強國人反英之情緒，而其熱誠於保衛東亞之努力”。此要點還指出：“英美帝國主義一日不倒，則中

4) 汪精衛；《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見於《政治月刊》第3卷第2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2年2月10日，第8頁。

5) 《上海特別市教育局訓令第0108號令市立第一中學校》和《上海特別市立第一中學校新國民運動萬眾簽署人名单》，見於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R-48-1445。

6) 上海特別市教育局；《上海特別市教育局通令0407號》，見於上海市檔案館，檔案號R48-1445。

国之独立自由一日不得确保”，“现在友邦发动大东亚战争，正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我人应以愤激来表示痛心，应以奋斗来清洗过去之耻辱。”⁷⁾

1943年1月2日在《中华日报》上，汪伪政府积极宣传对英美“参战”，从此新国民运动进入最活跃的年头。汪精卫元旦讲话《今年新国民运动之要点》提出“新国民运动”要更加深刻化，普遍化，要实行精神总动员，以“同安共危，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革命”。同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专门讨论向英美宣战后，如何加强“精神总动员”的“新国民运动”工作。会议提出了在运动中“强化中心势力”，加强党组织及政府官员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方针。1943年夏天，汪伪政权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开办了“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以及“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其训练方法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一样，重点为“大亚洲主义”的理论学习和“东亚联盟”及“新国民运动”的纲领的领会。随着汪精卫政府的“参战”，沦陷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所谓“战时轨道”。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都实行了战时体制。“新国民运动”作为思想文化统一的“教化运动”亦必须以服务战争为第一要旨。

1943年6月10日上海市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第17次会议中发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⁸⁾，基本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与友邦日本及东亚各国尽其至善至大之协力，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成，一面力谋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进而贡献于新秩序之世界文化”，并制定了宣传行动方针，“强化现有关于出版、新闻、著述、广播、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部门的机构，分别组成协会，协会组织完备后，组织统一性单一性的总会，所有协会属于在总会之下，以谋文化宣传体制之整备，强化检查机构对各作品进行严格审查”。为了贯彻此方针，“需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适应战时的需要，从事于体制之创立，力量之集中，思想之清理，观念之肃正。”《纲要》并提出了战时文化宣传工作的“七个要点”。这七个要点的中心为“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思想”、“扫除阶级战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未流习气”、“纠正盲目排外崇外之错误思想”、“综合国家民族共

7) 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82号宣传要点：《关于南京条约百年纪念》。

8) 上海特别市政府训令；《行政院令发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1943年7月3日公函，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8-53。

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力”，以造就与日本统治者同心协力的“新国民”。⁹⁾汪伪政权1943年11月于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促进统一，完成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是解放东亚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完成革命，获得独立自主的先决条件，中日同盟是理所当然”。

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幅统治图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沦陷区进行政治操纵和经济的统制，给上海市民造成精神恐怖与不安，战时经济体制掠夺了大量的物资资源，给上海市民带来饥饿、疾病、死亡的生命危机；同时，日本又用极大的力量推动“和平运动”，其核心就是要制造与灌输这样的虚假的意识形态：日本是为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为了从英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中国，为了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战争，共同建设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实现共存共荣。这样的虚假意识形态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合理化，使日本对上海的全面占领的道德化，以麻醉与压制上海市民的抗日意识，剥夺其文化抵抗手段，推行文化奴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宣传，已由“作战第一主义的宣传报道政策”改变为“掌握民心”、“民心建设”、“新文化建设”的宣传政策，特别是在日本在南洋获得暂时胜利以后，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宣传，更充满了使十亿东亚民族“具有日本式的世界观”的“狂言艺术”，其诱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¹⁰⁾

除了精神顺化外，日伪政权还通过镇压与收买的“两手”形式，策动上海市民内部分裂。他们在其他占领地区一样，在上海社会各领域中，先谋求中国“合作者”的帮助，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日本曾经操纵“合作者”扶植了伪政权¹¹⁾，上海著名的资本家傅筱庵¹²⁾取代1937年12月建立的“大道市政府”，当上了上海市伪政府市长。傅市

9) 上海特别市政府训令：《行政院令发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8-53。

10) 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11) 日军扶植的上海市伪政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以苏锡文为首的伪大道市政府时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28日）；第二是属于伪维新政府属下的苏锡文的伪督办公署与傅宗耀的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时期。（1938年4月28日至1940年4月3日）；第三是汪伪政府属下的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时期，市长为陈公博。（1940年4月至1945年1月），后来由周佛海接任陈公博。见于张铨、庄志龄、陈正卿著的《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153页。

长在日本特务“梅机关”影佐祯昭的直接指示下，成立以常玉清为首的汉奸恐怖组织和以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七十六号”¹³⁾。在租界内进行惊骇、绑架、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迫害与压制爱国人士的抗日活动。“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收上海黑帮社会的“青帮”和“红帮”的人马来充当人员，不论强盗、小偷、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都一律录用，他们的恶劣手段比早期的汉奸常玉清要高明得多。¹⁴⁾“恐怖人头案”、“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等教育界人士被刺案”、“茅丽瑛（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被刺案”、“郁华（高二分院刑庭长）被刺案”、“上海中国银行职员被拘捕枪杀案”等惨不忍睹的暴行，其手段使人惊吓失魂。他们还强行征集10余万女性充当慰安妇并设立慰安所。

日伪政权还颁布许多法令，使这样的镇压具有法律依据。“上海特别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在上海市的“治安”和“保安”的假名义下，发布了“取缔抗日及反和平报纸”的条例¹⁵⁾，命令各保安部调查“防范反动分子潜入辖境”、“共党潜入工人团体意图破坏治安”、“潜伏各地尤伤治安之活动情形有密切调查”的公函¹⁶⁾，用种种理由来监视与逮捕了上海的爱国抗日市民。1941年12月10日颁布了《取缔政治恐怖事件的八项办法》¹⁷⁾，主要内容为监视和搜查一切抗日活动；如稍有嫌疑即逮捕、审讯与杀害，哪一个地方发生事件，即将该地区全部无定期封锁，严禁任何人进出，“该地区住户代表

12) 他是前上海宗商会会长、蒋介石的宿敌，而1927年与当地军阀联系密切，因此国民党接管过程中，他拒绝蒋介石政权的财政援助，所以跑到日本人控制的大连躲避几年，日本占领上海后，让他当上上海市市长。他和国民党没有关系，而不属于南京的汪精卫“国民政府”，只听命于上海的日本占领军。见于王克文（美）：《通政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物资统制”的一个侧面》，见于上海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史学》双月刊1996年第2期，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96年4月，第49页。

13) “七十六号”特务机关；1938年底称为“中华轮船公司”，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对外称“特工总部”（又称“国民政府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驻沪办事处”），1943年9月8日李士群死后，改组为“政治部”和“政治保卫局”，1945年3月汪精卫死后，由陈公博主持改为“政治保卫部”。见于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390页。

14) 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17页

15) 上海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取缔抗日反和平之华文新闻纸》，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9-28。

16) 上海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奉保安司令部令为共党潜入工人团体意图破坏治安注意查缉》，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9-910。

17)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U52全宗，见于张铨、庄志群、陈正脚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288页。

拘送日本宪兵队，从严惩处”，诱导上海市民互相监视和举报。

在汪伪政权的资助和鼓励下，成立了许多亲日伪文化团体，作为汪伪政权的御用工具。中国大民会随着汪伪政权，其势力迅速伸展，其宗旨为“以提倡国民道德，施行中日亲善，奠定东亚和平，研究今后建国基础，讨论共同携手防共各项方略”，他们为“中日提携，以图东亚之资助兴隆”、“开中日共存共荣之门，为东亚创一新纪元”，而作为汪伪政权的主要帮凶¹⁸⁾。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于1941年2月1日成立在南京，其宗旨也是“促进联合东亚各民族以求东亚之解放”。中日文化协会于1940年7月28日于南京成立，目的在于“谋求中日两国文化之融贯，以植亲善之基础共同追求大东亚共荣圈”。除此之外，还有中华留日同学会、世界大同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中国新闻学会、中华报学会、中国作家联谊会、新闻记者公会，以及中德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中国妇女慈善学会、庚辰学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儿童教育协会、江苏文艺协会、华北体育协会、中华国医学会、中国自然科学会、中国合作社、中国电信协会等等¹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一切伪组的系统，一方面集合了大批各系统的汉奸分子，同时用以控制各类从业与专业人员，分裂爱国市民队伍。这样的组织化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三. 沦陷区杂志出版统制与出版界情况

日伪政权对上海沦陷区全面思想文化控制中，舆论控制是关键性的一个环节，他们对杂志出版实行了“强化战时出版体制”²⁰⁾政策。所谓体制强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18) 《历史与档案》编辑部：《日伪时期大民会史料选》，见于《历史与档案》总第14期，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12月5日，第44页。

19) 《一年来之文化事业》，见于《政治月刊》第2卷第6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2年12月10日，第107页。

20) 郭秀峰：《强化战时出版体制之要题》，见于《出版月报》第3、4号合刊，南京上海，1943年11月，第1页。

面对于出版、文化事业之管制强化，另一方面是对于所谓“合理”之出版事业的尽力扶助，这就一方面造成了上海出版文化事业的贬值，另一方面却促成了其畸形发展。

这也是“两手”：“严厉统制”和“大量制造”²¹⁾。“严厉统制”是企图彻底肃清中国人的抗日民族意识，全面控制报刊杂志。在日本的指使下，汪伪政府先后制定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取缔不良民众读物暂行办法》等法规条令。《出版法》于1941年1月24日正式颁布，共7章55条。《出版法》基本上是抄袭由日本人亲手制定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出版法》。《出版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里规定，“意图破坏三民主义或违反国策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经宣传部命令禁止登载者”，一律查禁。他们还实行申请登记制，“在县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发行者应呈转省政府核准，在省政府或行政院直辖市政府所在地发行者应呈转宣传部核准”，不许直接发行出版散布，如果违反禁令，发行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扣罚罚款，散布者也处六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罚款。对于报纸的检查，1941年7月1日，伪上海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特高科在一份报告中，称“谕办报纸登记，遵经分别通知各报馆在案，兹查报馆共57家，已来署登记者计有20家，尚有未登记者计37家”²²⁾。期间拒绝登记者更多。伪上海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通令所属各单位，对“未登记各报管辖”，除“通知迅予登记外”，“暂行禁止于管区内销售”，特别对《正言报》、《神州日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等报纸，“绝对不准在本管辖境内行销。派警员早晚在与租界毗邻出入口处，严予查禁，如有闯入，即行没收”²³⁾。

1941年7月10日，日本上海宪兵队也发出通告：租界内市民“凡出版图书刊物者”，“限本月26日前”，送交各联保事务所登记审查，严禁内容包括：(1) 一切有关中日亲善、中日提携之有损害之图书，杂志、教科书、传单、报纸、漫画、壁报等宣传品；(2) 如赞赏及崇拜无政府或要人之图书刊物等；(3) 如诽谤南京政府及要人之图书

21) 臧剑秋：《敌寇在占领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22)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19-0-280，见于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45-947页。

23)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19-0-280，见于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45-947页。

杂志报纸等；(4) 国耻纪念日标语或有解说之图书报刊等；(5) 其他一切认为有抗日及反国民政府之图书报刊等。“若不主动送交者”，“本宪兵队将随时实行检索”，并对责任人“依法严厉处罚之”²⁴⁾。

1942年2月11日“上海特别市沪西特别警察总署”公函中宣布，对“恶意宣传影响治安的电影院和公共娱乐场所”，并对“妨害风化并违背现行国策之表演应同时严加取缔”。²⁵⁾ 工部局情报处1942年8月6日发表公告²⁶⁾，表示他们派员在苏州河以南各书店及印刷所内，查获大批反动图书；警务处长为维护公共租界治安，并消灭抗日及反南京政府之宣传文字，警告持有反动图书者，应该自动送交就近捕房警务处，违反者严肃处理。日伪政权一边取缔反日大众媒体书籍，一边对报纸杂志进行严密操纵。1943年10月16日上海特别市宣传处公函²⁷⁾中，谈到“召开记者市政报道联席会议”，企图统一新闻报道规定每月定期召开报道联席会议，由中央社派遣固定记者与各机关经常联络访问，实际上是进行监视。

据有的研究者叙述，他们还施行“大量制造”，就是以“数量战胜质量”的政策。²⁸⁾ 到1943年10月10日为止，全国的沦陷区已登记或申请中的杂志有198种，其中在上海的杂志有87种（占43%），北京的有56种（占28%），南京有19种，汉口有7种，天津有8种，苏州有4种，杭州有3种，广州有4种，张家界有3种，其他广东、安徽、镇江、江西、南通、香港、宁波各有1种。²⁹⁾ 他们还印行了“无数奴化教科书与研究中国事件的书籍”³⁰⁾，出版了和平建国理论文献全书四十多万言，日伪宣传部直接出版书籍1942年12月约20种。³¹⁾

他们不断制造大量的“麻醉中国人的大批毒素文件”外，也有“欺骗其自己军队的读

24) 《申报》，上海，申报社，1942年7月12日。

25) 上海特别市警察局；《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特字四七号训令内开》，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9-910。

26) 工部局情报处；《反动书籍应自动缴出》公告，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9-616。

27) 上海特别市宣传处；《为定期举行市政新闻报道联席会议函请指定新闻报道负责人随时出席》公函，见于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R19-630。

28) 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29) 《全国杂志分类总调查》，见于《出版月报》第3、4号合刊，上海，政治月刊社，1943年11月，第18-20页。

30) 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31) 《一年来之文化事业》，见于《政治月刊》第2卷第6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2年12月10日，第110页。

物”，如华北《支那阵中》，华中的《阵中新闻》、《阵中画报》等，由此防范长期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日本军内“厌战反战情绪”。在发行组织方面，成立专门领导的机构“三通书局”，他们“专印伪教科书，通令各伪校采取”。还有在发行方式上，也采取“强制政策”，即所谓“硬派”。他们强迫市民订报，比如“小汉奸拿了《庸报》按户派订，如果不订，他就说；这是人家日本人上边的命令，不遵行要吃官司的。因此报纸有必定的义务，而无停购之权。”还有“散发和赠送”、“奖励”、“伪装或空中（即用飞机散发传单和数报）发行”等方法大量散布日伪政权的虚假意识形态。他们在小型汉奸报上，还特别利用“春宫画”、“裸体照片”以及题作情与淫、嫖娼、‘性交之道’、‘淫书概论’、‘三个女性谈性与艺术’、‘爱的战略’等一类肉麻污秽的文章，和叫做逍遥津、‘花花世界’、‘爱的区域’、‘别有天地’等”，以此危害和麻醉青年抗战意识。臧剑秋又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出版方面的“以华制华”、“挑拨离间”政策。³²⁾ 这就是日本出版报纸时，由中国人来出面，而盗用原来的名字来发行。比如“日伪特务机关还在上海假借共产党名义出版《红旗》，作文攻击国民政府，署名‘毛恩来’；天津《新生日报》及《国民日报》，则伪装抗战政府的面孔与口吻，以达到挑拨离间国共关系，使人民怨恨抗日政府及军队的目的。”³³⁾ 由此可以看到日伪政权巧妙进行沦陷区出版文化媒体的统制及其中的伪装性。

1944年一篇回忆上海全面沦陷前杂志出版的情况的文章，作者讲到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开始，盛极一时的上海杂志，几乎全部陷于停顿。后因若干文化人起而自办，销行甚佳，各出版商始亦继起创办新刊。但等到战事内移以后，又逐渐衰落下去。1939年5月，跟着政治的变动，杂志界忽然有了畸形的发展，新出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其中约可分为四派：一是抗战派，如《中美周刊》、《正言周刊》等；《上海周报》、《奔流文艺丛刊》等则系左翼文化人所主持。二是和平派，如《三民周刊》、《更生周刊》、《国际周报》等是。三是中立派，如《文林》、《文综》等是，其中有的是几个文人想办点文化事业，目的倒并不全在挣钱。四是营业

32) 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33) 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见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7页。

派，例如《西風》、《萬象》、《小說月報》等，則以牟利為目的，惟其內容，亦尚可供一讀。”³⁴⁾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進入上海租界，這意味着在租界活動過的所有抗日愛國報刊雜誌書籍的“厄運的到來”，所有帶有抗戰意識的雜誌，《中美周刊》、《正言周刊》、《華美周刊》、《正言文藝》、《文林》、《文綜》、《奔流》、《文藝叢刊》、《上海週報》等等，至少有20種以上全部停刊，剩下來的是只有“和平派”或“營業派”的雜誌，前者靠日偽勢力發行，後者是通俗性的商業雜誌，在日偽政權看來沒有太大危害，而可以控制得住，也可以利用它來宣傳日偽的思想意識，以“偽裝的寬容”誘惑上海市民，因而得以生存。

上海雜誌出版界到了1942年末進入1943年新年開始，出現了某種復蘇狀態。陳蝶衣在1942年12月《萬象》編輯室中描述“近一時期，與本刊同一類的新刊物，突然有風起雲湧之勢，已出版的已有二三種，在籌備中的據說也為數不少；站在文化界的崗位上說：這是一種好現象”³⁵⁾，《大眾》編後小記也說明了當時的出版界情況說“最近上海的出版界，突然呈現着熱烈現象，新的雜誌刊物，不斷地產生出來，雖然排印紙張的成本是那樣昂貴，而文化人努力耕耘的毅力，確是值得佩服的。據說各種刊物都有相當銷數，並可以賺錢，這也就足以證明精神食糧為民眾之需要。最近出版的巨型月刊《大眾》，更為出版界放出鮮艷的肥葩，網絡新舊作家，聚首一堂，壯諧雜陳，雅俗共賞，宜其潑日紙貴，傳誦一時。”³⁶⁾

上海淪陷時期經過了一段時間，無論對殖民者或被殖民者，戰爭都逐漸處於日常化狀態。這時候反而使上海市民感到精神上的恐慌，深切地需求“精神食糧”以尋求精神安慰和滿足，而文化出版編輯的人們也想要供給人們在現實苦悶中“一舒胸襟”的空間。³⁷⁾ 1942年除了《大眾》創刊以外，還有《女聲》、《古今》、《雜誌》、《萬象十日刊》、《新都》、《劇藝》等先後出版。而且有了這樣的聲明：“含情欲說宮

34) 楊壽清：《上海淪陷後兩年來的出版界》，原載《文藝春秋叢刊之一：兩年》，1944年10月，見於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245頁。

35) 陳蝶衣：《編輯室》，見於《萬象》第2年第6期，上海，萬象書屋，1942年12月1日，第235頁。

36) 《申報》上海，1942年11月10日版，見於錢須彌：《編後小記》，《大眾》第2號，上海，大眾出版社，1942年12月1日，第223頁。

37) 陳蝶衣：《前置辭》，見於《春秋》第1年第1期，上海，春秋雜誌社，1943年8月15日，第7頁。

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这是唐人的诗句，描写宫中妃嫔的苦闷，有话不敢当这鸚鵡前头说出，提防能言的鸚鵡给她们传播开去，弄出是非来。可是我们在《紫罗兰》前头，却是敢言的；可以直言的，并且不妨亲切如家人般和读者们谈谈。”³⁸⁾ 在《春秋》的《前置辞》中宣言：“现在的时代虽然无异于春秋之世，不过我们这个渺小的刊物，只是志在供给一般人作为苦闷时的精神食粮而已，决不敢象孔老夫子那样，以‘寓褒贬，辨是非’自在。我们不愿学贾长沙的痛哭流涕，有感斯发；也不想学桓子野的奈何徒唤，无病呻吟。我们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作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以提倡文艺为归，以介绍知识为的。”³⁹⁾ 除《紫罗兰》和《春秋》以外，1943年还先后创办了《风雨谈》、《文友》、《天地》、《文协》、《中华月报》、《天下》、《学术界》等文艺杂志。也有停刊的杂志，比如《经纶月刊》、《东方文化》、《国际两周报》、《上海艺术》、《人间》、《东西》、《万岁》、《中艺》、《中华周刊》、《中国青年》等。苏联方面所办的《时代》半月刊，以记载欧战与介绍苏联情况见称，销行颇广，又有《苏联文艺》不定期刊，专门译载苏联的文艺理论与作品，这两种杂志，自1943年秋意大利事变以后，大概是因为政治关系，便不见续出。

1944年创刊有《文潮》、《文史》、《小天地》、《文艺世纪》、《锻炼》、《文艺生活》、《大学周报》、《艺声》、《现代周报》、《小学生》、《新少年》等；据说还有几种刊物在筹备中，此起彼伏，不可谓少，不过它们的寿命是否长久，则很难说。1944年又有几种杂志停刊，例如：偏重于游艺评论的《太平洋周报》，《全面》半月刊，反英美协会办的《自由评论》半月刊，受宣传部补助的《大上海周刊》和《中国儿童》半月刊等，都先后停刊。几个文艺青年主办的《文艺生活》，全经会经济调查所创办的《经济研究》，都只出了一期。再如上海新闻协会创办的《上海记者》，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也陷于无定期了。到1944年虽然创刊的杂志日益增加，但是坚持已创刊的杂志更不容易了，大多杂志日日脱期或者延期出版，一个月又一个月延迟下去，而虽然延迟了生

38)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二）》，见于《紫罗兰》创刊号，上海，紫罗兰月刊社，1943年4月，第5页。

39) 陈蝶衣：《前置辞》，见于《春秋》第1年第1期，上海，春秋杂志社，1943年8月15日，第7页。

命，但是物價激增和日偽政權的控制紙張印刷使大多雜誌編輯發行人們透不過氣來。他們經常談到當局和奸商配給紙張的不定期和千萬價格根本擔當不起而無法出版，“在紙老虎大肆淫威之下，有好多刊物都已銷聲匿跡，而我們這一朵柔弱的紫羅蘭，也因不勝蹂躪而只剩奄奄一息了。可是我們偏偏不服氣，力能掙扎時，還想作最後的掙扎，於是這十八期終於在今天又與親愛的讀者相見了。”他說許多刊物在1944年和1945年之際結束了它們短暫的生命，其原因在於“紙老虎”的操作。《紫羅蘭》最後一期出版時周瘦鵬又告訴讀者非常時期出版雜誌的紙張確保的困難，他要掙扎盡力出版人們精神食糧的雜誌，盡力維持此食糧的分享。但是最後也是無可奈何，“這一期出版以後，下一期何時再可與讀者重見，還在未定之天；要是從此也跟着別的刊物銷聲匿跡，那麼這一回就要和讀者告別了！祝你們健康與快樂！”⁴⁰⁾。

1945年抗戰勝利的前夕，日本帝國主義的專橫政治達到極端，因此雜誌界幾乎沒有新出雜誌了，却停刊得多，比如《天地》、《萬象》、《風雨談》、《小說月報》、《文藝春秋》、《文潮》、《文友》、《女聲》等等。陳蝶衣對此描述為，“一九四五年的新歲，給出版界帶來的不是蓬勃氣象，而是一聲聲的喪鐘，由我擔任第一屆編輯的《萬象》首先宣告輟刊，接着是《風雨談》與《天地》的停止出版，而歷史悠久的《小說月報》與《家庭》，也陷入了催眠狀態，此外發行一二期而夭折的刊物更不知凡幾。這情形顯示了今日的出版界已屆臨不易支持的階段，因此本刊的存在也只剩下了僅餘的希望；明天，也許明天就是本刊與讀者諸君告別的時候。但在尚未絕望以前，我們仍愿以最大的努力從事於集稿及編纂。”⁴¹⁾

淪陷上海出版的雜誌數量看來比較多，可是其出版生命並不長，壽命最長的不過四五年也只有幾種，最短的不過幾個月，甚至一個月。原因是有的雜誌的經費全靠官方津貼，但是津貼數額有定，而工料價格日漲，終至無法維持。有些系私人或商業機關所辦，而銷行不廣，有虧成本，只好停辦了。⁴²⁾

40) 周瘦鵬；《寫在紫羅蘭前頭》，見於《紫羅蘭》第18期，上海，紫羅蘭月刊社，1944年12月，第2頁。

41) 陳蝶衣；《編輯室》，見於《春秋》第2年第3期，上海，春秋雜誌社，1945年2月12日，第164頁。

42) 楊春清；《上海創陷後兩年來的出版界》，原載《文藝春秋叢刊之一：兩年》，1944年10月，見於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48頁。

四. 沦陷上海出版文化人及其文化选择

面对日伪统治者的镇压与利诱，上海沦陷区出版文化人的分化，是必然的。范泉将其划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典型：“一种是坚贞卓绝，在苦难里不断磨练自己的文艺工作者；一种是为名利所诱地把国家民族作为出卖资本的文艺工作者”⁴³⁾。柯灵也曾说沦陷上海的文化人“屠刀之下，失地之间，展开奇景；一面鞠躬与跪拜，一面是流血与抵抗；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⁴⁴⁾。战争所带来的非常时期两种文化人有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

出卖自身的“失节文化人”，被称为“汉奸”、“落水分子”，为了保障身份和名誉、富有生活，他们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宣传日伪政权意识形态“和平”和“反共”思想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文化”意识。他们参加由日伪政权主持的各种文化活动，强制上海文艺界为此“鞠躬与跪拜”、“荒淫与无耻”，走向“和平文学”和“决战文学”等妥协之路。

还有不顾一切艰难的时代环境，坚持正义和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文化人，他们以文字作为战斗武器，为了中国民族独立而奋斗。虽然在沦陷区他们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而且有的被逮捕，受到严厉的酷刑，如许广平、朱维基、孔另境、柯灵、魏于潜、司徒宗、范泉等。还有夏丐尊、章锡琛、赵景深夫人李希同也被日本司令部逮捕尝到了铁窗的风味。郑振铎、王统照、唐弢、芦焚他们隐默在都市中流亡，还有楼适夷、李健吾、锡金、方君逸等人也各自流浪到远远的地方去⁴⁵⁾。散文作家陆蠡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后下落不明，郑振铎痛恨地感到“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⁴⁶⁾。

43) 范泉；《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见于《文艺春秋丛刊之五：黎明》，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9月1日。

44) 柯灵；《“自由”谈》，见于《柯灵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第217页。

45) 范泉；《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见于《文艺春秋丛刊之五：黎明》，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9月1日。

許廣平被上海日本憲兵逮捕文化界引起了緊張，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時被逮捕，這象徵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界開始毫無客氣地鎮壓及其鎮壓的程度將達到極點。因為留居在上海的文化人他們具有“日本對魯迅先生也很尊重，絕不會對你怎麼樣的”⁴⁷⁾的一點希望。可是他們這一點的希望完全破碎，日本帝國主義不顧中日文化界間際的交流成果，鎮壓的殺氣到了極點。此時對中國文化界進步文化人需要智慧的战略鬥爭，不能直接沖進去撞破帝國主義的牆壁。“當她被捕的消息傳出來後，許多文化人都急藏起來”⁴⁸⁾，準備避難後繼續做抗日文化工作。

許廣平逮捕之後，鄭振鐸立即離開了家，他“只隨身攜帶著一包換洗的貼身衣衫和牙刷的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著”，“無目的的向南走去。這時候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心境淒惶，然而堅定異常。”⁴⁹⁾，他“到張干若處商量隱居及改名易姓諸事（後改名為陳敬夫，獲得一某文具店職員的假身份證）。後來，又租到居爾典路一個空房隱居，不料對面一高樓後成為大漢奸周佛海的新居，鄭振鐸曾受到調查和喧鬧干擾，但潛居虎穴之旁近四年”⁵⁰⁾。他為了保存中國文化，與張詠霓合作全力以赴購中國珍藏圖書，寄給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代為保管，“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托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⁵¹⁾，因此中國在抗戰期間還是保存了“量 and 質 兩方面確實同樣的驚人”的國家圖書。他說“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⁵²⁾ 這就是抗戰時期文化人的文化責任以及文化選擇。

1942年8月2日出版的《雜誌》9卷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化人何處去》⁵³⁾文章。

46) 鄭振鐸；《蠶居散記·記幾個遭難的朋友們》，轉引陳福康；《鄭振鐸抗戰時期大事件年表》，見於《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1期，成都，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07頁。

47) 景宋著，《遭難前後》，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5月再版，第6頁。

48) 景宋著，《遭難前後》，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5月再版，第1頁。

49) 陳福康；《鄭振鐸抗戰時期大事件年表》，見於《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1期，成都，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07頁。

50) 陳福康；《鄭振鐸抗戰時期大事件年表》，見於《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1期，成都，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07頁。

51) 陳福康；《鄭振鐸抗戰時期大事件年表》，見於《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1期，成都，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06頁。

52) 陳福康；《鄭振鐸抗戰時期大事件年表》，見於《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1期，成都，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11頁。

53) 哲非；《文化人何處去》，原載《雜誌》第9卷第5期，上海，雜誌出版社，1942年8月10日。見於錢

作者提出文化建设问题，认为文化的存在，其本身属于“一个独立的主体”，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一环”。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种种影响，但其存在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时代的特殊条件，就战争不能改变“文化独立存在与其自存发展的意义”，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战争“所发挥的一时领导作用”是暂时的现象，文化的活力不屈服于战争，“战争的威胁无论怎样大，我们最后总能驾驭之并战胜之”。他强调在举世烽火威胁下，在更为艰苦的境遇下，中国文化人应努力发挥文化经营的精神。他提出战争时期中国需要“自己的发言人”，用批判和理智的精神来，出来发言，以斗争的精神，掌握“发言的领导权”，消除战时文化贫乏现象，积极参与中国民族文化建设。这就是文化工作者战争时期文化人的职责和任务。他所说的发言的含义具有三种意义，“第一以普遍的发言来恢复文化的活力，来推动新的文化建设运动。第二从普遍的发言中建树一种新的文化的领导精神，以之策励中国的复兴，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并求世界和平的早日来临。第三对于正义的信念应始终不变，如何树立正义，从现实的种种变化中，重新考虑方法问题，应该先从文化的观点的发言着手。文化人在动乱的大时代，尤其当祖国遭遇着空前危机之际，应该站在国民之前努力奋斗，树立标识，以领导民族脱离危境，这就是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还有一位作者在谈到对战争时期文化人的责任时，也说“静默的时候不是静默。它孕育着未来的高潮。在颓废的时候，文艺家应紧紧地把握着这个停滞的时代，并且，配合着这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批评它，推动它，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⁵⁴⁾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文化活动亦以上海为最盛。淞沪时期因战争的原因环境突变，有许多文人和出版人往内地转移，而另一部分留居的人，则以原有的立场不能适应新起的变化，因之始终保守着沉默，淞沪区的上海文学处于沉寂状态。

淞沪时期上海文艺的萎缩有两个直接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统制所造成的出版文化空间的萎缩和大量文化人的离沪。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后，中华、商务、世界、开明、大东、生活、光明等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七家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西风社等都被查封，《正言报》、《大美晚报》等报纸和《文苑月刊》、

理群主编，《中国淞沪区文学大系：评论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29-36页。

54) 丁谛；《文艺创作的动静》，见于《小说月报》第32期，上海，联华广告公司，1943年5月1日，第36页。

《文綜月刊》、《奔流新集》等文藝期刊也都被迫停刊。日偽政權在扼殺愛國、進步報刊的同時又大量創力和發行宣傳日偽政權思想意識的報紙和雜誌圖書，其報紙為《中華日報》、《新中國報》、《中華日報晚刊》、《中華周報》、《中華畫報》、《新中國報晚報》、《中國周報》、《國民新聞》、《國民新聞周刊》、《平報晚刊》等。1941年上海的日偽期刊共18種⁵⁵⁾，到1944年增加到44種。⁵⁶⁾在日偽的操作和接管下，大量製作的日偽一色的報紙雜誌，從另一方面縮小了愛國、進步文人的言說空間，實現了日偽政權對上海淪陷區報刊雜誌的統一管理與全面控制。

在日偽一色的文學空間里，有良知的文人為了爭取文化陣地確保活動空間，選擇了兩條路，一種是在與日偽無關的純粹文學雜誌里寫作，這些雜誌表面上追求“永久人性”、描寫“日常生活”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日偽政權沒有理由停刊禁止，這樣的所謂純文學的商業性雜誌有《大眾》、《紫羅蘭》、《樂觀》、《春秋》、《文潮》等等。另一種是中共上海地下黨暗中組織、經營的報刊雜誌，如袁殊等人所復刊的《雜誌》，它表面上以日本駐滬領事館作為背景，實際上雜誌的主要領導人如袁殊、魯風、恽逸群、吳誠之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梅娘在《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文中表述，關露亦在上海地下黨的指示下，打入《女聲》去做編輯，《女聲》是1942年軍事當局批准命名的婦女雜誌，駐滬日本使館給予相應的補貼，而早在上海開設多年的日本資本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擔了印刷。“皖南事變”發生不久，黨中央指示上海地下黨的工作採取“隱藏精幹，長期隱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文藝工作則強調不動聲色的鬥爭方式，力避在創作中拖光明尾巴的傾向，提出文藝宣傳“大眾化”，經營管理要“事業化”。正是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創辦《萬人小說》。⁵⁷⁾

留居在上海的文人的經濟生活非常艱苦。戰時的生活是畸形的，囤貨商人可以賺大錢，惟有文化事業卻是一落千丈，尤其與日偽政權無關的出版文化事業更陷於窘

55) 《新中國文化戰綫》，見於《政治月刊》第2卷第5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11月10日。日偽雜誌18種為《更生》、《國際週報》、《上海半月刊》、《遠東畫報》、《政治月刊》、《日本評論》、《社會月刊》、《文訓月刊》、《奮鬥》、《海風月刊》、《法制月刊》、《新科學》、《中國月刊》、《小朋友》、《青年良友》、《中西畫報》、《遠東貿易月報》、《時代文選》。

56) 馬光仁著，《上海新聞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23頁。

57) 謝其章；《上海淪陷時期雜誌週覽》，見謝其章著，《漫話老雜誌》，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5月，126-133頁。

迫。日伪政权除了汉奸文人外，对待文人作品都是采用了严格的检查威压的态度。在这样的趋势下进步文化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经常被禁止发行。恶意删除和故意扣压，几乎断绝了卖文为生的文人的生机，为饥饿与疾病所困，面临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存危机。蒋天佐回忆中的作家石灵的生活困境是很有代表性的，生活于“那间阁楼似的小房子，吱吱作响的楼梯和楼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们。环境险恶、工作繁重、睡眠不足、营养不良”⁵⁸⁾。《万象》曾专门发表文章《余叔岩之死》，这位曾演过《探母》、《定军山》、《空城计》、《卖马》等戏，与杨小楼、梅兰芳鼎足而三的一代名艺，得了膀胱癌症后，因为找不到排尿的管子，意然抱恨而死，享年54岁⁵⁹⁾。著名通俗小说家孙了红患了咯血症没有钱治疗，《万象》只得发布病情危急的消息，求助于广大读者的帮助。《万象》还在《作家、贫病、死亡》一文中透露，作家万迪鹤因患疾病，卧床已久，穷极无药而去世，延至1943年4月11日逝世。⁶⁰⁾ 顾明道忽然患慢性肺结核，病魔缠身写作已停止，形容憔悴，病骨之离，医药所费不足，其境况十分窘迫，虽经《大众》月刊捐款⁶¹⁾帮助可因贫穷而病死。可以说沦陷区作家是在吐血、饥饿、营养不良、死亡之间挣扎着坚守了抗战文化的阵地的。

他们生活在避难和隐居中始终不屈服于日伪政权各种陷阱、拷问和威胁，生活在贫穷和饥寒中也不陷入于与日伪政权有关的出版商金钱的诱惑，而是在确保和争取文化人的自主权利。他们把笔当作抗战武器，努力描写侵略战争的恶劣性和非人性的日常，暗中鼓吹抗战、反战意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自由，与日伪政权的假和平意识形态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意识形态相对抗。在直接呼吁抗日战争的报纸杂志大部分被停刊禁止，直接呼喊抗日意识的文人被杀害流亡离散的情况下，在处于生活的贫血状态下，留居在上海的文人还是选择了抵抗文学之路。日本帝国主义对文学空间的控制，生活的压迫，残酷恐怖的种种高压政策，都不能抑制上海文艺界爱国抗日文艺活动。上海文人在活动的空间几乎完全为占领者所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在缝隙中寻找空

58) 蒋天佐：《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工作回忆片断》，见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6页。

59) 吻雪：《余叔岩之死》，见于《万象》第3卷第1期，上海，万象书屋，1943年7月1日，第165页。

60) 《作家、贫病、死亡》，见于《万象》第3年第2期，上海，万象书店，1943年8月1日，第155页。

61) 钱须弥：《编后小记》，见于《大众》1944年1月号，上海，大众出版社，1944年1月1日。

间并竭力扩大,以确保能够在殖民统治下保存与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坚持对独立、自由的呼唤。在一片虚假的喧闹中告诉读者以真相,在干燥的田地里种下抗日的苗子和希望的种子:所有这异常艰苦卓绝的努力都表现了殖民统治下的无法压制与扼杀的精神力量。

那淞陷区作家,落实为具体的文学实践时,面对“如何写作”的问题,即写作的宗旨、原则与写作方式、策略的选择问题。

1942年7月23日《社会日报》副刊《燭火》里发表一篇文章,探讨淞陷时期文人怎样写作问题,强调“写作第一不能脱离现实”,要将“那些在社会阴暗面得不到阳光的人们的凄厉的苦状写出来”,“要把那般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人生惨况介绍于大众面前,使人们对之发生同情,怜悯,继之以授帮,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主要目的是研究其为何能成为如此的起因,而对于那般众瘦独肥的大人先生加以公正的批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实力的文学,生活实践的报应”⁶²⁾。淞陷时期作家自称为广大大众的传布机,他们强调文学把一切淞陷社会的苦痛,凶暴,淫荡,不平和憎恨,都毫不遮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把吃人血浆的大人先生们何荒奢淫侈,揭示给大众,这就是淞陷时期文学的任务以及责任。“要铲除只知利己,不顾害人的畜生道的卑鄙商人,无人格,无良心的劣等文人,提倡真的文学,埋葬死去了的无生气的文学残骸。而不应闭着眼睛,回避现实,应该把文艺的园地,做成反映现实的镜子”⁶³⁾。“真的文学”是从日常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淞陷时期的日常生活中的反常现象也可以作为文学对象,真实地描写出来。真的文学“反对虚伪的漂亮,反对文字玩弄者。喜欢美的,认为真的美,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所以有时愿意从美的角度来看真。认为这样比从真的角度来看要活得多”⁶⁴⁾。

淞陷区上海爱国文学采用“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⁶⁵⁾的间接斗争形式。淞陷区这特殊的环境,使他们不能直接谈反帝和反战的政治意识,而大部分淞陷区杂志都被日伪政权检查后才发行出版,因此不能刊载直接显示反帝反战的

62) 紫民;《怎样写作》,见于《社会日报》副刊《燭火》第54期,上海,社会日报社,1942年7月23日。

63) 编者;《〈新流〉我们的态度》,原载《新流》第1卷第4期,1943年9月15,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20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234页。

64)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见于《万象》第4年第5期,上海,万象书屋,1944年11月1日,第38页。

65) 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见于《万象》第2年第4期,上海,万象书屋,1942年10月1日,第130页。

具有政治性的文章。所以他们表面上表示“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以觉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⁶⁶⁾。在天昏地暗的沦陷时期，“说话有时候，有地方，然而也限于一定时候或一定的地方的，这便是一种适合于永久人性的说话，以及一种有益于日常生活的说话”⁶⁷⁾的选择。《春秋》也谈过“我们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做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一舒胸襟，多少得到些益处”⁶⁸⁾，但实际上选载作品“侧重于时间性的记述”、“现时局有关的文字”⁶⁹⁾。《乐观》创刊号中周瘦鹃说“我是一个爱美成癖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也爱花鸟，爱虫鱼，爱山水。我也爱诗词，爱书画，爱金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的结晶品，而是有目共赏的。我生平无党无派，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要是说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偏偏生在这万分丑恶的时代，一阵阵的血雨腥风，一重重的愁云惨雾，把那一切美景美观，全都破坏了”⁷⁰⁾。在表面上说不谈政治，只谈永久人性、日常的东西或自然的美等，“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写作选择对当时时局情势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这“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⁷¹⁾，在日常的生活中很深刻地反映着沦陷社会现实的惨象。他们关注沦陷区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写出了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的残酷，即日常生活中的饥寒，死亡，疾病，解释了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市民的痛苦，暴露了日为政权所发动的种种“运动”的虚伪性，更提供市民自觉的认识现实的机会。沦陷区文学没有像大后方与解放区文学那样热烈地直接呼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但是他们隐藏着悲愤冷静地叙述了沦陷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困

66) 《大众》创刊号；《发刊献辞》，1942年11月，见于谢其章著，《漫话老杂志》；《〈大众〉话语》，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5月，170页。

67) 《大众》创刊号；《发刊献辞》，1942年11月，见于谢其章著，《漫话老杂志》；《〈大众〉话语》，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5月，第170页。

68) 陈蝶衣；《前置辞》，见于《春秋》第1年第1期，上海，春秋杂志社，1943年8月15日。

69) 陈蝶衣；《编辑室》，见于《春秋》第1年第1期，上海，春秋杂志社，1943年8月15日。

70) 周瘦鹃；《发刊辞》，见于《乐观》第1期，上海，乐观杂志社，1941年5月1日。

71) 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见于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苦和艱難，通過這些淡淡的敘述，更深刻地探討了戰爭中的生命存在問題，是更具有一種內在的反抗意識的。

五. 小語

本文討論的是：淪陷區文化環境及其雜誌出版的文化選擇。淪陷區社會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佔領”與“被佔領”，“控制”與“被控制”。

這樣的佔領與控制，有以下特点。

一是“全面”，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思想，文化，無所不至。

二是“徹底”，不僅要佔領物質陣地，更要佔領精神領域，不僅要控制人的外在行為，而且要控制人的心靈。

三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不僅利用掌握的政治權力，用軍事、法律的手段進行公開的殘酷的鎮壓，用經濟的手段進行控制，而且製造畸形的繁榮，用資本、金錢的力量控制、腐蝕社會、人心。

四是在控制與限制的同時，也注重建設與發展，即所謂“和平建設運動”、“大量製造”政策等等，以製造將侵略戰爭與佔領合理化的虛假文化。

五是在被佔領者中製造分裂，灌輸順化、奴化的殖民意識，培植支持殖民統治的勢力。

這樣的佔領與控制是有效的，不能低估；但這樣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一是再嚴密的統治也有空隙，二是嚴密的控制必然要引發反抗。

於是，進步的文化機構與文化人就有了反佔領、反控制的文化實踐，從中暴露日偽勢力的虛假意識，而尋求真實的文學文化意識。

《參考文獻》

- 《万象》第1年第1期-第4年第7期，上海，万象书店，1941年7月-1945年6月。
《春秋》第1年第1期-第2年第6期，上海，春秋杂志社，1943年8月-1945年6月。
《大众》创刊号-第4年第5月号，上海，大众出版社，1942年11月-1945年5月。
《紫罗兰》创刊号-第18期，上海，紫罗兰月刊社，1943年4月-1944年12月。
《乐观》第1期-第12期，上海，乐观杂志社，1941年5月-1942年4月。
《政治月刊》第1卷6期-第9卷5期，上海，政治月刊社，1941年6月-1945年5月。
《中华日报》，上海，中华日报社，1942年1月-1944年12月
《社会日报》，上海，社会日报社，1942年1月-1943年12月。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马光仁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张靖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5月。
柯灵著，《柯灵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2月。
景宋著，《遭难前后》，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5月。
唐弢著，《唐弢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5月。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
应国靖著，《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广东，花城出版社，1986年10月。
谢其章著，《漫画老杂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5月。

《中文提要》

日军进入上海以后，他们试图全面掌握上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是上海沦陷区文学言说的基本背景。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占领者的文化政策，他们对文化人的怀柔 and 压迫，意识形态的操纵，如何利用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宣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帝国思想教育。与此相对峙的，则是上海文人如何寻求“正确的意识”进行不断的抵抗，揭示当权者意识形态宣传的虚伪性，以争取民众。

关键词：沦陷区社会文化政策，杂志出版，文化人的选择，控制与抵抗